

## 导 论

佩里·安德森

西欧的社会民主党素来拥有一派温文尔雅的形象。国际上社会党各政党似乎一直具有稳固的战后景观和实施相当平淡的政治改良的载体。后者虽然并不总是那么行之有效，可却特别令人肃然起敬。然而，一连串突如其来的政治地震近来已经为这种形象树起了一面令人惊惧的镜子。1993年2月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贝蒂诺·克拉克西(Bettino Craxi)——80年代意大利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曾两次出任政府总理——在指控他腐败的强大压力下辞职。他目前正流亡突尼斯以逃避逮捕。1993年5月，法国总理、社会党人皮埃尔·贝雷戈瓦(Pierre Bérégovoy)在五一劳动节饮弹自尽，原因是他的私人财政问题受到新闻界的质疑并且对该党在大选中的惨败感到失望。两周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恩霍尔姆(Bjorn Engholm)承认，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基督教民主党的竞争对手为什么衰落这个问题上，他撒了谎。然后，他辞职，稍后自杀。下一个月里，德国最强大的冶金工会的领导人、秘书长弗兰茨·斯泰因库勒(Franz Steikühler)，因泄露了他担任董事会劳工代表的公司的内部商业机密而被迫辞职。同一时期，西班牙反对菲利普，冈萨雷斯(Felipe González)政府普遍腐败现象的谴责达到顶峰。结果，1994年春，它的两名高官——中央银行和国民警卫队的

首脑——因非法致富而被起诉。一个身陷囹圄，另一个在逃。英国的工党——与它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的兄弟党派不同——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掌权了，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可这里也不得安宁。工党最重要的新闻赞助商和捐款人罗伯特·马克斯韦尔(Robert Maxwell)——前工党党员，他对《镜报》帝国的操控实际上是经过工党领导集团批准的——在英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诈骗案败露之后，从一艘豪华游艇上投海自尽。

轰动一时的事件已成过去。但是，90年代这一横扫西欧社会民主党的丑闻大洪水，并不必然地构成观测其未来的正确向导。当然，五个欧盟主要国家同时发生这样的事件不可能全都不具有重要意义。它们使人想到的，是存在于西欧重要左派组织的形象中的更加广泛的道德危机。在过去，要整个地方的社会民主党全以一种声音说话，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欧洲的西半部在传统上被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区域。<sup>①</sup>历史地看，第二国际的群众性政党崛起于北方诸国。在这一区域里，要么存在以重工业较大规模集中为基础的数量巨大的工人阶级（英国、德国和比利时），要么存在愿意与工人结盟的小农场主阶级（斯堪的纳维亚），经典的社会民主党在此扎下了根。群众性政党、强大的工会和早期的选举优势，标示出了这种北方改良主义的本质特征。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曾有过执政经验，可不管怎样，直到二战之后，它才在整个区域里成为一支常设的统治力量。正是在战后的长期繁荣中，英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才在没有什么重要的左派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攫取政权。许多国家（英国和奥地利最为重要）实现了对精选出来的工业企业的国有化，但公有制并不是它们的首要目标。北方社会民主党最纯正的特征莫过于以充分就业和广泛的社会保障为内容的福利国家的建

设。它们的实现形式和实施范围随着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不过，人们很少将这些成果仅仅归功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创。然而，这些政党所取得的政治成功，却总是建立在由这两项成就而获得公众支持的能力之上的。如此创生出来的政治支持被证明是累进性的。因此，不是在 50 年代或 60 年代早期，而是在 70 年代早期，作为一个整体，北方社会民主党的好运方才如日中天。1974 - 1975 年间，社会民主党获得了战后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全面胜利。那时候，它包揽了整个区域所有国家的总理之职 英国、西德、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瑞典和芬兰。

一旦这种政治颠峰状态或多或少地被达及，物极必反，支撑北方改良主义获得成功的那些经济条件就开始悄然退场了。70 年代中叶，经济增长率已经下降，通货膨胀率不断加速上升，失业率居高不下。很清楚，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进入长期衰退时期。在这个新的历史关头，社会民主党缺乏的不仅是应战危机的有效政策。当复活了的货币主义意识形态拣选过度的国家开支和过于强大的工会作为滞胀的关键原因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突然发现自己正与这种滞胀相关联。结果，社会民主党曾经驾驭的舆论掀起了一轮反对福利政策的浪潮，它促使该地区的右派政府全面上台。以 1979 年英国撒切尔政权的大选胜利为起点，运动波及西德和低地三国 \* 尤其不寻常的是，它还蔓延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在这些年里，只有奥地利和瑞典抵制住了这一趋势。80 年代的统治模式因此非常清晰。面对重新获得生机的右派对其战后优良政绩的全面攻击，北欧左派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政治基础和理论基础。

南欧左派的成长走的是一条相当不同的发展道路。在法

\* 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译者注

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工业化过程总的来说进行得不够彻底或较迟，所以，在落后的农业文明背景下，宗教神职人员和封建领主的影响通常还比较强大。在第二国际的鼎盛时期，无政府的工联主义是这里的主流；在两次大战之间，第三国际成为劳工运动的领导力量，而到 1945 年它则创立了共产党。如果说较之于北方左派，南方左派在政治上更激进的话，那么，它在组织上则要薄弱一些。在这些现代化程度较低的社会里，战后政治力量的天平绝大部分时间里总是明显地倒向右派。在冷战开始之后的 30 年里，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的政治霸权一直牢不可破。在法国，戴高乐第五共和国的建立确保稳固的保守统治达 20 年之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独裁政权从战前一直延续下来，只是到了 60 年代，希腊的文官政府才执掌政权。时过境迁，长期的经济繁荣也在地中海地区产生了效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逐步侵蚀了统治秩序的基础。70 年代后半叶，佛朗哥 (Franco)、萨拉查 (Salazar) 和帕帕佐普洛斯 (Papadopoulos) 政权最终倾覆。在法国，德斯坦 (Giscard d'Estaing) 维持戴高乐传统的政策连续性的能力显而易见地正在下降。而在意大利，安德烈奥蒂 (Andreotti) 为了扩大议会支持不得不与意大利共产党 (PCI) 进行非正式磋商。

作为长期未被承认的政治选择的承担者，迟到的政治秩序的自由化为左派提供了显而易见的机遇。在这三国中，权力更迭由于采取了抚慰性的君主立宪制而保持了与苏联相反的西方传统，共产党试图把自己定位为这一权力转换过程之自然的候选人。但是，欧洲共产党适应新形势的尝试到处都未能奏效。我们不难发现，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实际上都是按照第三国际的标准建立起来的，因此，它们不得不面对来自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手的竞争。后者虽然在起点上更加脆弱，但较之于前者，其发展态势则要强劲得多，因为它没有国际

官僚机构和在与东欧政权的外部联系中形成的其他类似障碍。由于这些欧洲社会主义组织——社会党(PS)、意大利社会党(PSOE)、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PSI)——的兴起并突入国家政治舞台的核心，所有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迅即招致挫败。在葡萄牙和希腊，共产党虽然还没有重建，可结果却是一样的。葡萄牙社会党(PSP)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迅速超过它们，而后者完全是一个新兴产物。

当国家权力最终易手的时候，受益者因此不是革新了的共产党，而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民主党。在战后政治角色的倒转中，就像北欧向右转一样，南欧向左转了。80年代初，密特朗成为法国总统，冈萨雷斯、克拉克西、帕潘德里欧(Papandreou)和苏亚雷斯(Soares)分别成为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葡萄牙的总理。这些政府的构成极不统一。在法国、西班牙和希腊，社会党占据议会的明显多数席位，而在意大利和葡萄牙，社会党则只是执政联盟的领导者。欧洲社会党起初寻求的政策也不完全一致。法国人着手实施了一个关于国有化、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和控制通货膨胀的雄心勃勃的计划，除了希腊的较小范围之外，这在其他任何地方还没有相应的尝试。西班牙一开始就寻求传统的经济政策，意大利同样如此。不过，到了这个世代的末期，一般资产负债表的科目就已经很醒目了。南方的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再生产出原先那种北方模式，即与强大的工会运动连接在一起的大规模的劳动阶级政党。它的领导集团典型地由一些能上不能下的职业政治家构成，相应地存在一个异质性更强的选民阵营，和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实力上都不是上升而是跌落的工会。它也不能重复北方在战后所创造的充分就业的辉煌：整个80年代，该地区的失业人数一直居高不下。社会党执政时间最长的西班牙拥有欧洲失业人数的最高记录。

另一方面，即使不是福利国家政策的主要创造或全部，其中

温和的社会改良措施也还是被象征性地引入了。由此虽然带来了一些城市现代化,可是,那里的法律体系还是陈旧的,民主程序依旧得不到保障。这些政府的所有举措无不紧密地受到当时国际形势的制约。来自国际市场的相同压力在北方导致右派上台,而在南方则成为左派用以抑制任何过激冲动的理由。一旦法国克服周期性通货膨胀的最初努力在 1982-1983 年遭受挫败,绝大多数的欧洲社会党执政的国家就简单地在全球经济的大潮中随波逐流了。在这 10 年的后 5 年里,它成为里根赤字经济政策掀起的投机狂热的被动受益者。这一政策在较为成功的选民阶层中鼓吹高消费,而对穷人和失业者却几乎什么也没做。在意大利,这一模式由于在克拉克西执政期间带来了似乎无法遏止的繁荣而得到广泛赞同,在西班牙第二届冈萨雷斯政府执政期间,情况也是如此。

尽管如此,这一与福利改良主义的经典模式相去甚远的、社会民主主义南方版本的实行——它因为法国、西班牙和希腊以及相对提前的意大利重新选举而得到确认——却依旧得到维护,以弥补 80 年代运动在北方遭受的失败。在西欧的政治均势中,瑞典社会民主工党(SAP)的幸存统治抵制了新自由主义转向,奥地利社会民主党(SPÖ)的联合执政也理应被算在内。政治全景应当说是混杂的,但也不是漆黑一片。事实上,它是这些年来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发生的相对重大的综合作用的一个后果。在“社会民主党的终结?”一文中,沃尔夫冈·梅克尔(Wolfgang Merkel)以令人叹服的细致,追踪了西欧 16 个主要国家社会民主党直至 1990 年的运作情况。对这一问题之新兴的政治学研究目前正处于最佳状态,然而,梅克尔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作品,它还包含一个深思熟虑的争辩。<sup>②</sup>形形色色的批评家——新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宏观调控理论家以及合理选择分析论者——从不同

角度都提出：社会民主党已经历史地处于衰落之中。在与他们的论争中，梅克尔以统计学的精确性说明与 1945 - 1973 年这一阶段相比，作为一个整体，欧洲社会民主党无论是在选举力量上还是在政府权力上都没有遭受损失。就其发生而言，他坚信，政策的退却被夸大了。出于对改良理想冷静而忠诚的信仰，梅克尔以一个乐观主义的注释结束了他的著作。不管条件怎样变化，社会民主党事实上相当成功地抵御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当一个“超越市场的宏观调控新需求”出现的时候，它没有理由不重新繁荣。

对于一个忠诚而谨慎的观察家来说，情形只要看看 1990 年的资产负债表就行了。其后的结果对它并不友善。在北方，瑞典走‘第三条道路’的尝试彻底失败了。自 20 年代以来，瑞典社会民主工党于 1991 年第一次下野，并把政权移交给了保守党领导的政府。到 1994 年夏季，国内失业人数达到劳动力总数的 14%，这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最高记录之一。在南方，法国社会党在 1993 年的大选中一败涂地，这使右派获得了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最大份额的议会多数。在意大利，意大利社会党（PSI）——曾经是联合执政的核心——已经被淘汰出局。在 1994 年春天的大选中，它甚至连一个众议员席位都没有捞着，这使一个更加激进的右派联合政府掌了权，近来，它中间大多是法西斯主义政党。几个月后的欧洲大选为整个欧盟范围内的左派境况拍了一幅凄凉的快照。在西班牙，社会党被它保守的对手们第一次彻底打败了。在法国，社会党的得票跌至不足选民的六分之一，这迫使作为党的领导者的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辞职。在意大利，左派之最大的残余部分——新近改宗的社会民主党（PDS）——从前的共产党人如今变成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得票缩减至不到选民人数的十五分之一，迫使奥其多（Achille Occhetto）辞职。在德国，经历了科尔（Kohl）

12 年统治之后，社会民主党 SPD 的得票跌至 50 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只是在英国，工党赢得议会多数，作为传统的左派政党取得了胜利。但是，投票结果如此之低——几乎不足选票总数的三分之一——以至不能为未来提供什么可靠保障。较之 80 年代末期的结果 90 年代中叶之后的统计学令人更加难以感到欣慰。此时，南欧已经急剧向右转，而北欧左派却没有做出什么令人宽慰的收复失地的举措来。

国家的选举周而复始。存在于西欧国家间的种种差异促使大选不可能完全同时地进行。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仍将存在下去——例如写作该文期间的挪威、丹麦、奥地利、西班牙和希腊，而且它们将赢得未来的大选。同样的情形无疑将很快在瑞典发生。但是，一个根本性的路线危机已经很明显了。虽然乐观的评论家认为东欧共产党的垮台所强化的东西将能使社会民主党振作起来，但是，危机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它依旧要证明温和的体制改良就是它相反的历史选择。结果，市场意识形态在东方取得了如此彻底的胜利，以致它反弹回来反对西方任何实行经济调控和社会福利的国家。这一后果将持续多长时间现在还很难说。可它目前的影响是令人震惊的。因为它是在西欧不得不从战后最恶劣的衰退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发生的。如今，群众性失业已经不仅仅是远高于美国或日本的水平的问题了，它实际上比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水平还要高，而且没有任何长期改善的前景。<sup>③</sup> 西欧现在大约有 2000 万人失业，这超过了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人口总数。然而，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病的治疗方案，社会民主主义的吸引力根本没有得到巩固，相反，为自己原初的存在理由提供了那么多证明的灾难的复归进一步削弱了它。它曾经是抵制广泛失业计划的主要勇士，但是，面对一个接着一个的商业周期所带来的失业大潮的稳定上涨，它现在似乎退化为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社会民主党可能没有

终结。可是，谁能怀疑它现在正处于僵局之中呢？

历史地看，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左边始终存在着其他政治力量，为首的当然就是共产党。今天，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那从十月革命传承下来的政治血统的理论基础差不多已经消失殆尽了。意大利曾经存在过西欧最宏大的共产主义运动，如今，它已经衰变成一个小得多的社会民主党了。它阵容稳健，取代了意大利社会党的位置。别处的共产主义传统则坚持过着一种不可靠的暮年生活。有代表性的是，较之于社会党国际，它仍然聚集了一小部分选民，更加激进地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治安排。这些党派与正统教义和原则断绝联系的程度，变化极大。瑞典共产党是一个极端，它早在 70 年代就进行民主化改革，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开放的左派政党。希腊共产党和葡萄牙共产党则是另一个极端，它们的面貌大致未变。除了严重的内部分歧之外，法国共产党和它的前身很相像，只不过尺寸有些缩小罢了。同时，西班牙共产党在联合左派联盟的范围里重构了自己的形象。意大利共产党并没有全部融入社会民主党之中，而是在“重组”中留下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余部。即使是在德国，共产主义传统也在东部群众的抵抗中得以幸存。所有这些党派目前的得票率都在选民人数的 5% - 10% 之间。它们的全部选民人数都比绿党的人数多，目前在绝大多数国家，只有左翼社会民主党方才可与之匹敌。在丹麦或挪威这样的地方，具有民粹主义特征的左翼社会党在对共产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内部反抗中诞生，它们把自己建设成了具有耐久的政治特征的党派。在政治选择中，当最低限度的平等的代表权能够得到保证的时候，另一个超越社会党国际边界的左派就出现了。在西欧这个整体中，这是一个普遍惯例。但不管怎样，它在哪里都没有机会单独组阁，它惟一的执政希望就是与一个强势的社会民主党结盟。对于后里根时代的资本主义，它持有更加尖锐的反对意见，

可它解决问题的方案却并不比以往更丰富。至少是现在，这一政治领域的存在对于缓和左派的纲领性困境作用甚微。

在这些条件下很清楚，我们需要对近年来的经验进行比较反思。这卷文献所提供的就是这样一种盘点。它的原文是10多年来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新左派评论》是一个在英国出版的杂志，但它却拥有国际性的作者群和读者群，作为对英国政治文化研究中存在的条块分割传统的反拨，它较早对西欧左派的多样性产生了兴趣。就切入主题的问题而言，本书在已经存在的大量方式中标示出了一种新的路径。传统上，研究欧洲左派的文献容易落入两个窠臼：一个是对北方经典社会民主党的研究，一个是对南方共产党或——近年来的——欧洲社会党的研究。这种划分曾经很有道理，但在今天，它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梅克尔的比较测定，以对贯穿半个大陆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选举和“权力商数”（power quotients）的定性分析克服了它的不足。虽然梅克尔对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的运作的真实报道常常是尖锐的，可还是存有太多的选择性。但在这里，有代表性的区域平衡已经得到关注，它第一次试图给予以斯堪的纳维亚为代表的北方、盎格鲁-德意志的中部和说拉丁语的南方以平等的注意。结果并非无一遗漏。像芬兰、冰岛、奥地利、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这样存在于三大板块边缘的国家就被省略了。低地国家和瑞士这样的宗教和语言的马塞克同样也被忽略了。优先权被给予了这三个西欧资本主义板块中的主要国家。

这些论文的第二十个显著特点在于它们聚焦所要观察的国家案例的独特方式。当下研究政党或政治运动的最严肃的著作莫过于现代政治学作品了，它专门从事定量分析和相互关联的统计学分析。这种分析模式对于理解选举制度、投票模式和联盟原则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对社会的长期动力学机制和意识形态

冲突的关注则相对较弱。这些论文不是要丢掉前者所提供的洞见，而是要在前者的基础上，典型性地寻找重建这些国家的左派的发展道路，并适时地给予深入的历史叙述。在丹麦和挪威的个案中，整个社会对海外情况所知甚少，国家的政治图景可以一直追溯到 19 世纪。更加普遍的是，当下制度规则的起点——瑞典的福利国家、意大利的“解放”、德国的“冷战”、法国的第五共和国——其实已经为理解自身提供了一种切合实际的出发点。但历史并没有在这些描述中被赋予一种必然性的烙印。政党被理解为一个进行自由选择的集体行为者。历史回顾不是要把它们的发展道路归结为某一前定命运的拨弄，而是要揭露没有实现的可能性、错过的机遇和同样经常性地被避免的错误，正是这些构成了它们历史档案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左派，这里的论文持有一种独立的然而又不是宗派主义的立场，同时又对官方教条持批判的态度。它们差不多对某些被读者印象深刻地获得的事实都提供了一些与事实相反的思考。

同时，他们还寻找道路以贯彻葛兰西格言的精神：“从专论的角度来看，撰述一个政党的历史就是去撰写这个国家的历史。”<sup>④</sup>由此，每一章都尝试着在当下论述的国家的全部政治力场——不仅包括右派显著的政治构架，也包括与左派的发展有关的更广泛的同盟军和敌人——中，去定位左派的发展历程。在这个一般背景中，因为每一篇论述都要强调它认定的特定国家的政治情景中最突出的特征，所以视角的转换自然非常宽广。开头论述瑞典和挪威的两章首要关注的并不是福利国家——这一外国人容易感兴趣的普通对象，而是它们战后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对此，乔纳斯·庞图森 (Jonas Pontusson)、拉斯·穆塞特 (Lars Mjøset) 和他的同事争辩说：使这两个国家欣欣向荣的社会改良的物质条件早已为人所熟知；但是，理解其中左派的命运的关键恰恰在于它的宏观经济管理。

他们所展示出来的事实和以往的一般理解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分歧。瑞典紧跟着雇佣工人基金的失败、“第三条道路”的暂时成功和最终失败而出现的劳动力市场调控是一种模式。挪威的“信用社会主义”（它在为石油价格所软化的自由化进程中被拆解构）是另一种模式，它目前的失业状况较轻。但每一种经验的原创性都还保留着令人注目的地方。丹麦是其他地方重要发展的预报者，在这里上演的是另外一种戏剧。尼尔斯·芬·克瑞斯狄森 Niels Finn Christiansen 在这里解释说在丹麦明显的阶级构成中，激进的小资产阶级较之于乡村的同类更加强大，这既促进了传统社会向城市化社会的重要转变，也因此由西方民粹主义右派在这里发动了反对福利国家的第一次重要的税收叛乱。在传统的工业选区和新兴的公共服务选区之间，左派阵营中都浮现出了第一条明显的分界线，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人民党（SPP）之间的对立折射出来的是下一个有前景的研究主题。

正是在德国，由这种分歧所导致的困境以最令人着迷的形式上演着。在那里，60年代晚期发生的最深刻的文化反抗和新生代反抗为绿党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较之于社会主义人民党在丹麦的所作所为，德国的绿党对社会民主党的官方政策采取了一种更加尖锐的对立立场。斯蒂文·派杰特（Stephen Padgett）和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追踪了那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试图抓住新老选民的时候日益麻痹它的张力，面对公然的“后物质主义”竞争，这种张力具有日益不同的外观，它竟然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像布里丹的驴子那样无法选择。我们清楚地看到，没有其他哪个欧洲国家，关于左派的政治和理论争论会被赢得议会多数这个战略构成问题所左右。如果相同的争论在英国出现了，那么，它们会以缓和得多的方式来进行，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没有相对而言的政治反抗文化，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选

举制度的性质与众不同。后者正是彼特·迈尔 (Peter Mair) 为本论文集提供的作品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在英语世界里，工党吸引了如此众多文献的关注，以至同样的政治基础在这里会被视之为当然接受下来，成为讨论的不需言明的前程。从 1979 年到 1992 年，工党经历了欧洲社会民主党所能忍受的最糟糕的一连串失败，它的选举厄运已经被爱娃·克瑞 (Ivor Crewe) 非常好地标示出来了，同时，它的政治变迁已经是乔治·爱略特 (Gregory Elliott) 热情洋溢的《工党政策和英国的特质》一书重新关注的对象了。<sup>⑤</sup>在这样的语境中，重点讨论最不被人关注的东西自然更加可取，当然，决定工党政策特征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及其在英国独特的选举制度中的处境还是需要辩论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迈尔对投票制度和激进政治策略之间的关系比较分析，对左派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上述这些因素的相互关联在意大利几乎是不需要强调的，因为在 1993 年赢得第二次全民公决之后，社会民主党就取消比例代表制采取了有利于自己的选区制。历史地看，自从凡尔赛时代以来，正是欧洲的右派——以极好的理由——典型性地采取了有利于自己的不成比例的代表制度。<sup>⑥</sup>在意大利 墨索里尼是在两次大战之间引入它们的第一人，贝鲁斯科尼 (Berlusconi) 则是现时代从中获益的第一人。在这里，选举工程是“现代化”政治这个使拉丁国家一致起来的更广泛主题的一部分。要是赋予这些社会以古希腊和罗马那样真正古朴的众多社会机制，那么，左派确立的、以交换为目的的、对选举权限的追求也就不可能诉诸现代性的理想。但是，没有一个能指会如此多变。在法国 乔治·罗斯 (George Ross) 和简·詹森 (Jane Jenson) 认为共产党在它正当的时候放弃了无政府主义这一即使它在今天也极其依赖的传统，无疑自取灭亡；这一放弃换回来的是共同纲领、一个以改变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的界限为目的的、总的看来非

常胆大妄为的企图，它颇受欢迎，并跃跃欲试，可缺乏现实的成功机会。不过，他们也同样指出：社会党意识到了共产党的失败，因此转向了对公司和市场的过度崇拜，把它们视为实现现代化的巨神，它的转变所招致的失败可以说是咎由自取。西班牙几近 40 年的中央集权独裁专制使右派与国家的地方工业精英隔绝开来，这给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以较大自由。虽然这被迟到的劳工运动特许权延长了一些时候，但正像帕屈克·卡米勒 Patrick Camiller 已经清楚地说明过的那样，它在 90 年代也变得令人非常恼火。主要原因对上述三国都适用，但它在意大利却得到最广泛的展示。超越市场调节的、没有任何内容的现代性是一个危险的字谜，它的敌人是无所不在的腐败。在克拉克西的全盛时期，金钱腐蚀政府还是一种个别现象，所以，意大利社会党一跃成为最突出的政党的起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它适应了意大利社会的世俗化过程，而意大利共产党则为之所拒绝。如果说 80 年代的这一后果对意大利左派是一个巨大的灾难，那么，结果就决不仅仅是意大利社会党政治生命的彻底结束，同时还应当包括意大利共产党的不体面退场。对此，陶比亚斯·阿伯瑟 (Tobias Abse) 争辩说，主要原因是，60 年代以来，意大利共产党在创造性地回应人民群众反对旧秩序的渴望和斗争高潮问题上持续不断的无能。

宏观经济管理、社会集团、选举公正、公众和睦、文化现代性，这些就是社会主义的希望在西欧左派的议程中已经被删除的时代西欧左派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在它们背后现实发生的是西欧左派战略处境的双重改变。首先是选区的碎片化。第二国际、第三国际诸政党或它们的战后继承人可以在一个同质的社会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纯粹的劳工运动现在不啻是一个神话。上溯到 60 年代，制造业劳动阶级无论如何都是左派执政党所召集的社会联盟之富有魅力的政治核心，这一点

在南欧或北欧都一样。工业无产阶级从数量上讲是选民中最庞大的组成部分，从结构上看是组织化程度最高的，从品行上讲是最独裁的。这些党派的政治领导阶层可能来自职业政治集团或知识界，它们的选民还包括从中低阶层和农民中来的部分人；当然，同时大量的工人时常也把票投给保守的党派。毫无疑问，这正是意大利理论家用劳动阶级的“向心性”这一术语所要表达的意思，即围绕左派融合成为一个力的编队。很清楚，今天的情况已不再是这样的了。<sup>⑦</sup>在过去的 20 年内，当传统的农民、手工业者、店员失去了独立性，同时家庭主妇也成为劳动力的时候，雇佣劳动就普遍地扩散开来了，即使在最近出现的自我雇佣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新的例外。不过，在雇佣工人阶层内部，分工显然已经极大地发展起来了。

五条区分的轴线现在使任何以激进变革为目的的联合运动都变得更加困难。其中第一条是一个其分布模式已经转换了的老问题。较之于美国或日本，欧洲在制造业劳动和职员劳动的地位和收入问题上一直存在更重要的对立，这一点在集体组织化程度和政治面貌上得到反映。今天，它们在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欧劳动力总量中所占据的比例已经倒过来了。制造业劳动阶级已经下降到从事经济活动的总人口的略多于四分之一的平均水平，在各个地方都被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超过。即使在白领工人已经达到很高的工会组织水平、在传统上与劳工运动的客观目标相一致的地方，比如说在瑞典，他们的相对比重的客观改变也使他们与产业工人以往的协同连结变得松弛了。同时，在制造业劳动阶级内部，技术、收入和安全感的跨度也在稳步拉大。<sup>⑧</sup>一方面，在里根时代繁荣起来的高技术部门的熟练工人，他们的物质境况从来都没有变得如此有利于生活，这对他们的投票模式留下了经常性的深刻影响，在英国，这使撒切尔获得了巨大成功。<sup>⑨</sup>另一方面，非熟练工人和临时工——要么拼命挣

扎 要么长期失业——的数量膨胀起来了。在两者之间，经典的手工制造业的半熟练操作人员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影响上都衰减了。结果是体力劳动内部的社会两极分化，同时它的最受剥削的集团和特权集团之间爆发了不断增长的利益冲突。

如今 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都比较迟 而退休的时间也延长了，因此，另一种社会分层也就日益变得重要了。年龄现在以新的方式把雇佣劳动工人分割开来。一方面，青年期延长了，它不再是成年期迅即降下帷幕的序曲。接受学校教育较迟（或者被认为是这样）的人群和工作较早的人群现在大多融合进入一个自我包容的青年文化圈，除了政治环境高度紧张的时刻，一般说来，这个圈子中的青年人是不愿意与新生代往来的，虽然他们自己刚刚才从这一时期度过，他们同时也不太关心阶级问题或地域问题。另一方面，出生率的降低和生活费用的上涨使人口中的年长者的作用也发生了一般变化。现在成年人大约平均有三分之一的生涯是在从劳动力市场退出来以后的日子里度过的。福利国家如今已经无法抗拒地变成了这一社会群体的公共支持体系，他们的养老金和医疗费花掉了整个社会开支的三分之二。<sup>①</sup>结果是一个既是财政的也是文化的分层逻辑，它使雇佣劳动工人的第二年龄段，处于在它上面的第三年龄段的需要和下面的第一年龄段的驱迫的夹击中，因而是一个潜在的政治压力位。

如果说上述改变已经把曾经很容易聚拢的选民分散了的话，那么，劳动力的性别分化的影响就要模糊得多了。传统的左派选民团在性别问题上总是显示出有亏空。在传统信仰或家务隔绝因素的影响下，妇女中总是有比男子中更多的人去投保守党派的票。例如，两者之间的缺口曾大到使英国工党在 1951 - 1964 年间无缘问津政权的地步。女性在雇佣劳动中的稳定增长——在欧盟平均占男性劳动力的 60% 在斯堪的纳维亚是

70%——被认为已经消弱了这种模式。历史性反转的标志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在许多国家的选举中，已经有超过男性数量的女性投票给左派了。不过，转换还是分散的和短暂的。迄今为止，由家庭妇女数量的相对下降导致的政治力量的潜在加强，可能因为男性主导的工会运动已经在调适女工数量的增加这个实际困难而被过高估计了。在西欧绝大多数地方，工资的性别差距依旧很高；即使在差距较小的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人们也还在不断要求工作的性别分离。也就是说，在更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的净指数不是减少了，而是上升了。

最后，西欧从传统的移民出境国向移民入境国的转变——这比其他分化因素更加臭名昭著——已经腐蚀了绝大多数国家劳动人口中的文化一致性。如果说少数民族的多样化使得它的大都市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了，那么，它的政治代价则是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症状的不规律然而确凿无误的上涨。欧盟现在从亚洲、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移入的人口总数大约是 1300 万。德国、法国、英国、瑞典和比利时大约有 10% 的学龄儿童具有非欧洲血统。美国的经验显示，种族和民族分离的后果可能是劳工运动——当然是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相互依赖运动——的提示物。劳动阶级成为反对移民的右派的蓄水池——在法国、意大利、法兰德斯\*、奥地利、丹麦——是碎片化可能加剧的警告。民族身份政治学是不可能为左派提供满意的地形的。

工作、收入、安全感、年龄、性别、种族起源等等的差异如此尖锐，以至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已经无法缝合那被要求挑战既有状况的社会权力主体（collective agencies）。选民的分化使为激进挑战进行精神动员这个任务内在地变得更加困难。但

\* 比利时西部和法国北部的一个地区。——译者注